

论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笔下的女性之死

[中國] 林敏洁*

“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刘义庆《世说新语》¹⁾里的言谈警句。鲁迅先生认为此书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²⁾则恐怕是将“生”、“老”、“病”、“死”这种人生历程及人生不同阶段、不同感受的四个字组合在一起变为“生老病死”这一短语在中国典籍中最早的记载。而这并列的四字短语被视为苦难的象征，则是受佛教理论的影响。

佛教同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传入中国。生、老、病、死本是人生无可逃避、逾越的自然规律，无论古今中外、贫富贵贱，概莫能外。佛教认为，这是人生所必须经历的四种痛苦，简称“四苦”，也称果报“四相”。《莲华经》³⁾注：“生、老、病、死，四苦也。”《百喻经·治秃喻》⁴⁾译注：“世间之人……为生老病死之所侵恼。”相传释迦牟尼未出家时，曾经在王城四门分别目睹了分娩、老人、病人和为死者送葬的景象，于是心生感悟，决心舍弃太子之位与王位继承权而出

* 東京學藝大學 amin246@hotmail.com

1) 刘义庆（南朝宋）《世说新语译注》张撝之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

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

3) 智疏《妙法莲华经》（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10月

4) 《百喻经译注》 蓉生译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年03月

家修道，以求超脱生、老、病、死之苦，而达于彼岸极乐世界。

除“四苦”之外，佛家还有“八苦”的说法。佛教《大般涅槃经》⁵⁾中详细阐述了“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从而奠基了“人生是痛苦的”这一悲观厌世理论。

“生”、“死”是相反相对的概念，是矛盾的统一体。死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生命体都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无论贫富贵贱，都不可能青春永驻。古代曾有不少人幻想长生不死，如秦始皇、汉武帝，然而他们虽然费尽心机，千方百计搜寻求索不死之方，结果仍如竹篮打水，空忙一场，难逃命丧黄泉的结局。

由于人类对死亡普遍抱有恐惧和排斥心理，因而对死亡大多讳莫如深，不愿提及。然而死亡现象又是如此司空见惯和不可避免，于是汉语中便出现了许多关于死的委婉说法，或曰避讳说法。譬如古代天子之死称：“崩、驾崩、山陵崩、大行、晏驾、千秋万岁后”等；大夫之死称：“卒、捐馆舍”；士之死称：“不禄”；庶民之死的婉辞则更多，诸如：“没了、去世、过世、下世、逝世、谢世、辞世、故世、弃世、厌世、仙逝、西归、长眠、永眠、大限、作古、升天、长辞、弃养、百年、仙游、寿终、见背、登遐、长别、永别、永诀、魂断、撒手人寰、驾鹤西归、一病不起、寿终正寝、不可为讳、天夺其魄……”这些对死的委婉说法，表现了人们趋吉避凶的思维观念和对语言的灵物崇拜，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对死的避讳，也体现在传统的文艺创作当中，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喜剧、正剧较多而悲剧较少；“大团圆”的结局较多，而“令人扫兴”的结局较少，尤其是对善良正直的人物和美丽的形象，总希望他们有个美好的结局，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的反映。

萧红是一位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她像她的导师鲁迅一样“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⁶⁾，而绝对对现实的粉饰。在她的作品里，充满了

5) 《大般涅槃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02月

6) 鲁迅 《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对女性悲惨命运的由衷关注和对女性死亡的直接描写。她是把人生的虚无，特别是女性人生的命运，写到了顶点、写到了极致的作家。

从佛学的观点看来，死亡也许并无所谓痛苦，因为善良的死者要去“天国”，其他死者也不过进入“六道轮回”而已。善良的死者最终能否进入天国暂且不论，如果是享尽人间富贵后突发的瞬间死亡或者悠闲地老死家中，寿终正寝，旁边还有菩提音乐，死得也还算美妙。但是萧红笔下所描写的众多女性死者，则是在饱尝人间苦难之后，毫无尊严地活生生地被折磨而死。萧红笔下的命运极为悲惨，残得让读者感到，假如这些被折磨而死的女性可以选择的话，她们下世绝不希望再投胎人间。

令人震惊的是，在笔者整理出的萧红作品中的死亡全像表中，竟然几乎全是女性之死。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当属十分罕见的特例。笔者与1997年注意到这一点并曾撰文论及其女性意识⁷⁾。

萧红写于1933年的《王阿嫂之死》被公认为是她的第一篇小说。该小说写了一位丧夫后虽身怀六甲，却惨遭地主暴力、连同早产的孩子一起离开人世的女性之死。写于1941年的《小城三月》是萧红短暂生涯中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文中则描写了一位“不知为什么死，大家很纳闷”⁸⁾的女青年，萧红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以女性之死开篇并以女性之死终结的。

笔者认为从《王阿嫂之死》到《小城三月》女主人公翠姨之死，这些看似完全不相似的死亡，却让我们得以窥见萧红思想的变化过程，发现其人生理念与创作理念及超越时代的意识及其悲剧命运之所在。本篇论文将解读这些人物命运的描写阐明萧红的创作动机，思想意识及其发展轨迹。

7) 拙稿《论萧红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彷徨》 艺文研究74 庆应义塾大学艺文学会出版社 1998年

8) 萧红《小城三月》收入《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 1998年

二

笔者曾将萧红小说中死亡群像做一简要的归纳。请参见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萧红作品中所描写的女性死亡者共计18人。其中，直接或间接死于民族压迫（外敌入侵）和阶级压迫者计8人，不过一半。其余的死因则是由于贫穷和女性自身的宿命。而实际上，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有时又同女性自身的宿命有着深刻联系。

萧红小说中的女性死亡表

作品	创作年	人物	年龄	身份	死亡原因
《王阿嫂之死》	1933	小环的妈 王阿嫂	“中年” “中年”	农村寡妇 农村寡妇	被地主的儿子强奸后羞愧气愤而死 丈夫被地主烧死后，自身又遭地主暴力， 连同刚生下的婴儿一起丧生
《哑老人》	1933	小岚	青年	女工	被女工头殴打而亡
《生死场》	1934 ~ 1935	小钟	3岁	农民幼女	母亲忙于农事时跌在铁犁上丧生
		月英	少妇	农夫之妻	瘫痪后得不到丈夫照料致死
		王婆	老年	农妇	服毒自杀未遂
		小金枝	幼儿	农民之女	被贫困的年轻父亲摔死
		女学生	青年	学生	被日军抓去后，处死
		冯丫头	青年	义勇军	当义勇军时战死
		麻婆子	中年	农夫之妻	被日军杀害
菱花奶奶	老年	农妇	因儿子被日军杀害绝望而悬梁自尽		
菱花	3岁	农民幼女	被祖母在同一房梁上吊死		
《呼兰河传》	1937 ~1940	小团圆媳妇 王大姑娘	12岁 青年	童养媳 碾官之妻	被婆家和跳大神的折磨而死 在草棚里产后死
《后花园》	1940	冯二成子妈 老王	老年 中年	碾官之母 碾官之妻	死因不明，大概是病死 产后两年死亡，死因不明
《小城三月》	1941	翠姨	青年	寡妇之女	“不知为什么都死，大家都很纳闷”死因不明
《红玻璃的故事》	1943	王大妈	“中年”	贫妇	突然精神忧郁死

作品中女性的死亡表面看起来死因极为简单。然而只要认真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每篇作品中作者的创作主旨其实并不单一，作者在对每个女性的人物

之死的描写中予以了多层内涵，表象的描写下深藏着作者对女性生存状态以及女性命运的怀疑及悲观认识。所谓女性自身的宿命，一方面指来自女性自身生理特点和性别特点，另一方面指因这些特点所决定了的其不同于男性的社会角色分工和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及其永远无法摆脱、逃避的可悲的历史命运。

萧红所描写的18个死者当中，除女工、女学生、义勇军战士各一名外，其余15名均为农家女性，约占死者总数的83%。可以看出，萧红所关注的女性对象，固然涉及多种职业和多种身份，但仍然以在农村生活的女性为主。这不难理解，因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农耕社会，农村人口的比例一直很高，即使进入20世纪70年代，农村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85%以上，则旧中国农村人口的比例之高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农村女性其实就是关注了全国的大多数女性和女性的主体。此外，萧红从小生活在偏远的小县城，接触和了解最多的也是农民，因此她主要写农村女性，同其生活经验的积累非常契合。

在18位女性死者当中，年龄最小的是小金枝，出生才一个月；其次是两个同是3岁的死者小钟和菱花；再次是12岁的小团圆媳妇——四人均未成年，占死者总数的20%以上，由此可见，当时生活在贫困农村的女性婴儿和少女们，未冠而夭折者比比皆是。除四名未成年人以外，其余14名死者均为成年人，其中青年6名，“中年”5名，但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女性结婚生孩子大都是20岁左右，即晚婚也不过三十左右，因此这里的中年以现代的眼光来衡量则只能定在青年这个范围，现代社会也把这个年龄称为青年，但萧红的笔下却下意识的将其称为中年，所以笔者在此将其加上双引号，这里已经体现了萧红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感触，而萧红笔下的老年也只有3名。

从死者的年龄结构分布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女性，从婴儿到幼童，从少年到青年，从中年到老年，无时无刻不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就像狂风暴雨中的枯叶，随时可能坠落、飘零。这就难怪民间流行“黄土埋人无老少”的谚语了，同时也深刻表现了旧中国底层女性由于种种磨难随时面对无常大鬼的普遍性。

三

接下来具体分析几个萧红笔下女性之死的原因。就死亡原因而言，18位死者当中属于正常死亡者几乎没有，全可认为非正常死。在萧红的文笔下即使称为老年的人群也没有一个是因为老而死的。

倘如我们把因各种疾病而死看作正常死亡的话，也可谓极其稀少。这里姑且先把冯二成子之母、王大姑娘、老王、月英4人作为正常死亡，——即使这样，也仅占死者总数的22%。而其余的78%均属于各种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古人称之为“非正命”。

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又多种多样，有被虐杀者，有因意外事故而殒命者，有自杀者，也有被日军杀害者，有为生育而死，更有因为看不见前途与出路而导致精神抑郁而死者。从中不难看出，旧中国的女性们欲尽享天年，寿终正寝，实在比登天还难。

萧红的女性之死的描写是由《王阿嫂之死》开头的。《王阿嫂之死》是萧红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小说，该文章的主旨通常被定义为反阶级压迫，但笔者认为当时的萧红已开始了对女性命运的深思之旅。从小说的命名《王阿嫂之死》及对主人公王阿嫂之死的深刻描写都可以发现萧红对女性宿命所持的怀疑。

在《王阿嫂之死》里萧红用写实的笔墨，在我们面前直铺出了一幅女性为履行生育天职而死亡的悲惨画面。

王阿嫂自己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是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⁹⁾

王阿嫂遭遇了丈夫被地主烧死，自身又因为怀着身孕而招来地主的暴力相向，最终在早产中死去，她的死状是惨烈可怖的。

9) 萧红《王阿嫂之死》收入《萧红全集》 哈尔滨出版社 1998年

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内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¹⁰⁾

在家破人亡的打击下，王阿嫂已无力承载更多的苦难，最终就在自己的血中，在生育生命的过程里步入死亡，生与死的衔接以女性生命的献祭作为代价，换取新生命的延续，但是那个新的“小动物不到五分钟也死了”。在这里，萧红将女性的生育这一历来常被传颂的神圣行为，竟然等同到动物一途来描写，揭示了即使女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缺乏爱的给予和养护，人和动物一样也只有死路一条的悲惨命运。作者的描写显然是对女性天职产生了巨大的疑问：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去执行生养的这一行为是否还有价值和意义？

除了惨死的王阿嫂之外，作品还描写了一个连自己名字也没有的女性——小环妈的悲惨命运。在萧红的所有作品中女性的名字都很少出现——这符合旧中国重男轻女、妇从夫姓的社会现实。小环妈是一个农村寡妇，被地主的儿子强奸后羞愧、气愤而死。仅在这个女性人物之死的描写上，我们就可以发现作者萧红对女性生存及女性本身命运的怀疑。小环妈在忍受丧夫的痛苦打击之外，还忍受着贫困的折磨及阶级的压迫，然而与此同时，就因为自身是女性而遭到来自男性的迫害——未能逃脱被残暴强奸的命运。小环妈在被强奸之后，感到无比羞愧，气愤。最终，这种来自于封建社会里女性特有的道德观、耻辱感又断送了女性自己的生命。

这就深刻地反映出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女性得忍受贫困及阶级压迫等多重煎熬，而来自男性的暴力欺辱又使得女性无法逃脱，无路可走。作者意识到这无可改变的性别问题将长期存在。其次，女性的羞愧及气愤的心态、即在封建传统社会里女性自身所特有的道德价值准绳及心理状态，其实也同样会扼杀女性的生命。

也就是说，通过《王阿嫂的死》，萧红还告诉读者：数千年积淀、传承下来的封建伦理道德与贞洁观念，同样是缠绕在中国妇女身上的无形枷锁，在一

10) 萧红《王阿嫂的死》收入《萧红全集》 哈尔滨出版社 1998年

定条件下这种枷锁同样可以置妇女于死地。

即使所谓正常死亡者，其实也有不少非正常因素所形成的巨大合力加速了其死亡。这里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例如《生死场》里温柔美丽的月英，病瘫后非但未能得到有效的医治和适当的护理，反而遭到丈夫的冷落、嫌弃与虐待，每天忍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焉有康复之理？焉有不速死之理？

月英曾被称为是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性格温和，充满柔情。然而当婚后她变瘫以后，丈夫开始从怜惜到嫌弃，进而打骂虐待，从月英的两位朋友去探望她的字里行间，让我们辛酸地读到了前后判若两人的外貌变化。

“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牙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¹¹⁾

从疼痛着不能自由躺下，身上生着蛆，只能坐在肮脏的排泄物里控诉其丈夫的言语里更感受到她所遭受的苦痛。月英临死前有如下一段哀诉：

你们看看，这是那死鬼给我弄来的砖，他说我快死了！用不着被子了！用砖依住我，我全身一点肉都瘦空。那个没有天良的，他想法折磨我呀！¹²⁾

精神上的折磨又深深损害了她的全身心。这些都加速着一个女人的全面崩溃。于是，三天后，月英被装进棺材，葬在荒山下。笔者从中不仅读到尘世间的病痛在伤害着女性的同时，那些丈夫们的冷血更是把美好的女性送上死亡之路的真正根源，是他们丢弃了自己的良知之后，葬送了曾经鲜活的月英嫂们，萧红通过小说对社会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萧红对夫权、男权的批判，集中体现在《生死场》中。该小说通篇没有任何有关爱情的甜美描写，只有表述动物性本能冲动的“越轨”的文字，男人像发

11) 萧红《生死场》收入《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 1998年

12) 同上

疯的野兽充满了袭击力，女性则如稚弱的绵羊和小鸡，是两性欲望的客体和被施虐者。男权、夫权同样给女性带来深重的痛苦与不幸。笔者在此不予详加论述。

诚然，月英之死，也死在贫穷二字上——因为贫穷，丈夫便不可能花很多钱替她多方请医买药；因为贫穷，丈夫也不可能抛弃赖以养家糊口的生计而每天陪伴在她身边悉心照料；因为贫穷，当然亦不可能有充足丰富的营养食品供其享用。不过，贫穷而外，丈夫对妻子的轻视、漠视外加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即男性对女性的轻视、漠视外加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无疑也是促使月英最终死亡的加速器。

再如碾官之妻王大姑娘，因为力气大、眼睛大、辫子长、说话响亮而遭到愚昧无知乡民的诸多无端非议，并为她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对其进行人身诋毁。同碾官成亲后，针对她的流言蜚语更是此消彼长，不脛而走。她所忍受的精神痛苦与心灵折磨不言而喻。婚后住在“五风楼似的”破草棚子内，身上只能盖一些柴草取暖。她前后生过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她身子就一直没养过来。因为穷平时极为节省，连一根柴草也不肯多烧。生小孩时，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吃。结果第二个孩子出世不久，她便匆忙离开了人世。可见导致王大姑娘死亡的原因，一是精神痛苦与心灵摧残，二是因长期贫困而引发的营养不良和身体严重透支、失调。三是因为产后没有得到好的照顾及营养补充，这也是对女性的所谓人类再生产使命的一种怀疑。

这就向读者透露了如下沉重的信息：旧中国的广大农村妇女，在忍受贫穷和被贫穷折磨的同时，那些在某些方面同其他女性稍有不同的女性，甚至相貌、体魄、性格出类拔萃的女性，有时还要忍受来自周围的同样是穷人们的种种无端非议和流言蜚语的心灵折磨，从而促使她们过早离开人世。而那些折磨王大姑娘心灵的穷人们的所作所为，则充分表现了旧时代中国农民身上的那种愚昧、麻木、无知、无聊、丧失同情心、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本质上属于同类相残的劣根性。

萧红对这种劣根性的描写，虽然笔调轻松、舒缓，娓娓而谈，甚至语涉幽

默、调侃，其实字里行间饱含沉重的心绪，充溢着深沉的哀怜，其内心是沉痛的，笔触是沉重的，揭露是深刻的，基调同其恩师鲁迅一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堪称“长歌当哭”。原因是，至简至明的事象，显而易见的事理，在无知乡民那里却变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无可理喻。愚鲁顽固的乡民们，文化素质如此，精神境界如此，思想方法如此，实在可悲可叹，可悯可怜！但这又不仅是乡民们的悲哀与不幸，本质上乃国家、民族的悲哀与不幸。

又如《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即小童养媳）之死，死因比较复杂：既是婆家人（族权）对其长期无休止，惨无人道地肉体折磨与精神虐待所导致，又是封建迷信（神权）对其肉体和精神双重摧残的必然结果。她本是个健康活泼的少女，“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脸长得黑乎乎的，笑呵呵的”，“见人一点也不知道害羞”。可自从到胡家当了小团圆媳妇后，便开始了刑罚的日子：

过了没有几天，那家就打起团圆媳妇来了，打的特别厉害，那叫声
不管多远都可以听得见的。

……

后来越打越厉害了，不分昼夜……¹³⁾

不仅如此，胡家还多次将她吊在房梁上，用鞭子抽得她昏死过去，还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而如此折磨她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她婆婆说的“给她一个下马威”，“规矩出一个好人来”。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摧残下，小团圆媳妇病了，而且越来越重，“夜里说梦话，白天发烧”。为了不丧失这个劳动力，胡家为她请来了跳大神的。那大神敲着鼓，命令当众脱下小团圆媳妇的衣服，把她按在滚烫的热水缸里，不停地往她头上浇热水，致使她昏倒在缸里。“小团圆媳妇当晚被热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几天后，小团圆媳妇一命呜呼。

很显然，小团圆媳妇的病死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是她婆家非人的摧残所致。她婆婆年轻时大约也受过自己婆婆的虐待，可是“多年的大路走成河，多年

13) 萧红《呼兰河传》收入《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

的媳妇熬成婆”，当她成为婆婆以后，却用相同的甚至变本加厉的残忍方法折磨自己的儿媳，同类相残，全无收敛，全无忌讳，其手段、其心态都让人不寒而栗。这当中固然有其个人的主客观因素在，但本质上无疑是其腐朽的封建女性观使然，是其视儿媳为奴、为物、为家庭私有财产的封建文化观念使然。

更令人痛心和发指的是，小团圆媳妇重病中还要承受“大神”的淫威，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被剥光衣服，公然受辱，饱受摧残。她的命运固然悲惨凄苦得无以复加，而愚昧、落后、丧失人性的民间陋俗的杀人本质，胡家人以及乡民中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客，其人性之丑恶，良心之泯灭，更令人瞠目结舌，无限悲哀。可见，虐杀小团圆媳妇的，不光是胡家，还有那可憎可恶的封建迷信与民间陋俗，以及浑浑噩噩的乡民作为帮凶。

换言之，萧红用笔描写的是东北乡民的愚昧无知与迷信可笑，其实哀叹与批判的乃是民族性与国民性中沿袭了数千年之久的可怕痼疾，即中国农民被扭曲了的病态灵魂。

四

如前所述，萧红的笔下描绘了大量的女性死亡形象。死亡本是人世间最恐怖的事情，不断地想到死亡、描述死亡，表明主人公生活得很阴暗与凄凉。萧红在小说中对女性死亡的描述，是悲惨的连续剧。

在萧红描写女性之死的后期作品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后花园》、《小城三月》和《红玻璃的故事》。《后花园》发表于1940年4月。这篇小说写了两位女性之死，一个是磨倌冯二成子的妈妈，另一个是冯二成子的妻子。作者对二位死者的死因都未作明确交代。关于冯二成子的妈妈，萧红这样写道：

刚来的那年，母亲来看过他一次。从乡下给他带来一筐子黄米豆包。母亲临走的时候还流了眼泪说：“孩儿，你在外边好好给东家做

事，东家错待不了你的……你老娘这两年身子不大硬实，一旦有个一口气上不来，只让你哥把老娘埋起来就算了。人死如灯灭，你就是跑到家又能怎样！……”

……

母亲回到乡下去，不久就死了。¹⁴⁾

关于冯二成子之妻，作者又接着这样写道：

可是冯二成子也有了小孩了，磨坊里拉起了一张白布帘子来，帘子后边就藏着出生不久的婴孩和孩子的妈妈。

又过了两年，孩子的妈妈死了。

……

不久，那孩子也死了。

笔者认为，萧红不具体写明冯二成子两位亲人（母亲和妻子）的死因，是颇具深意的。在封建社会和旧中国，广大普通劳动人民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经济地位，被统治阶级轻蔑地称为黎民、庶民、草民、贱民。黎民谓其终日劳作，面目黧黑；庶民，谓其人数众多；草民，谓其多如野草，贱如草芥；贱民，则直接谓其低贱、卑贱、轻贱、下贱。

试想，既然老百姓像野草一样多而且贱，其早死、速死又属必然，则其死亡原因自然显得无关紧要。就像一棵野草，有谁去在意它是绿了还是黄了，是枯了还是死了？有谁去在意它干枯的原因、死亡的原因呢？死了就是死了，追究其死因纯属多余，没有任何意义。

普通黎民百姓是如此，女性作为黎民百姓中更卑更贱更弱势的群体，当然更是如此。《小城三月》发表于1941年7月香港《时代文学》第1卷第2期，是萧红的“绝笔”，也是萧红长期观察思考中国女性命运而发出的动人“绝唱”。文中的陈述背后已潜藏着作者令人深思的创作理念。在30年代旧中国激烈动荡的时刻，萧红带着真诚的悲哀，用她的笔描述了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惨遭遇。而用女

14) 《后花园》收入《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

青年翠姨之死则并不是为表达女作家善良的同情，也不是为唤醒人们。

即使对著名文学作品的研究，往往也存在着潮起潮落，从一种视角到另一种视角的转变。对《小城三月》的探析，近年来就呈现着这个过程。《小城三月》在萧红的小说作品研究中，长久以来或被轻视，在过去的研究中多谈萧红作品的反封建婚姻意识，但是没有揭示出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女性作家萧红的创作理念和个性思维。80年代开始出现几位研究家，有过一些好的视点¹⁵⁾。近年也还有更多的研究者在尝试如何从更加准确地把握作家的心理状态来分析作品的实质。至此更准确地把握萧红创作的内含实质便更成为当今的课题。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萧红貌似漫不经心的写法背后的内心深深的隐痛，感受到她对底层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感受到她对旧社会、旧世界的否定。

世界名著《灰姑娘的故事》展示了一个心里善良，可命运又很可怜的女孩子，但是她因为心地的善良最终会变成了白雪公主。可《小城三月》的主人公寡妇的女儿翠姨，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同样身材苗条、羞涩漂亮，是一个正在想要读书的少女。少女怀春，自五四运动后吹起的新文明，也在呼吁女性追求自己的爱情。翠姨很自然地爱上了正在读大学的地主家的公子。

公子自然是待翠姨很好，但是翠姨变不成白雪公主，她被许配给了一个丑陋但是小有钱财的男人。命运却又对她感到了折磨，在她闷愁地到哈尔滨置办嫁妆的时候，带她去街上采购的，却正是自己喜爱的“公子”介绍来的同学。这样翠姨更加破天荒地感受了一下新的文明世界的春风。萧红的笔下如此道来：

偏偏那带着她去采办嫁妆的向导又是“我”的堂哥哥给她介绍来的同学。他们住在哈尔滨的秦家岗上，风景绝佳，是洋人最多的地方。那男学生们的宿舍里边，有暖气、洋床。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姨当然受了他们不少的尊敬，请她吃大菜，请她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车让她先上；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每一动别人

15) 如尾坂徳司『ある中国女流作家の挫折』燎原書店 1983年 黄甫晓涛《萧红现象》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8月 第93-107页 李重华《小城三月的思想性与人物来源漫谈》收入《萧红研究》哈尔滨出版社 1983年

都为她服务，外套一脱，就接过去了；她刚一表示要穿外套，就给她穿上了。

翠姨更加大开眼界。灿烂阳光下的文明世界，展示着重重的新理念，那样舒心、和谐、那样动人，同暗淡保守的封建家庭反差这样强烈，翠姨会何去何从呢？笔者萧红在作品中直发其抒：

不用说买嫁妆她是不痛快的，但那几天，总算是她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象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

经这到哈尔滨去一买嫁妆，翠姨就不愿意出嫁了。她一想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就恐怖。¹⁶⁾

从情理和逻辑上讲，此后翠姨似乎应该公然反抗家庭和社会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反对包办婚姻，甚至要离家出走。但事实却同读者的愿望相违，从城里回来之后，翠姨并没有表现出对包办婚姻的任何抗争，只是变得“整天地闷闷不乐”——这显然是其内心纠结与陷入矛盾的表现。结局是，“翠姨支撑不了啦，躺下了”，在“出嫁之前悄然死去了”。显然，在与新文明的碰撞中，默守陈规的闺房女子心底里终于萌发出解除枷锁，追求婚姻自主的愿望。这是女性觉醒过程中第一次鲜明的对人权和尊严的追求，却恰恰是这第一次恩泽于新文明的对人性自由的欲望，给女性带来盘根错节的困惑与无奈。从翠姨的死，即作品的结局里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者萧红悲哀地领悟到新文明赠给女性的第一个礼物，却不是新生，而是更大的困惑甚至是绝望。

萧红24岁写《生死场》，在哈尔滨国际协报连载多次，也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¹⁷⁾，作品自有深刻的寓意同精彩的手法。《小城三月》先

16) 萧红《小城三月》收入《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 1998年

17) 斯诺与鲁迅的谈话收入 斯诺编活的 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附录348页 (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纽约, 1936 年)

展示出巨大的反差，在预示走进城里，走向光明的时候，又使用了一个“偏偏”，这个“偏偏”害过多少人，它表示事实跟所希望的恰恰相反。作者萧红耐人寻味地使用了“偏偏”这个词，一方面我们可理解成作者有意向读者传递某种不祥的信息，同时我们也可窥见潜藏在文字背后对跨越历史时空条件的女性觉醒所产生的深刻不安。萧红意识到新妇女解放运动，在当时更多的是一个梦，这个梦会带来高层次的希望，但大多数是由于新的幻境而带来的绝望。

具有同样创作理念，并且明显地表现了萧红邻近生命终点时的真实心境与创作动机的作品—《红玻璃的故事》，在萧红去世的第二年（1943年），经骆宾基整理后发表了。该作品是萧红在临终前口述的，作品不但长期未得到学界重视，甚至至今也鲜为人知。

中国有句著名的成语《黄粱美梦》，描述着青年卢生的故事。萧红的《红玻璃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和《黄粱美梦》是异曲同工，同样是短暂的瞬间，同样产生了一个改变了的人生追求。所不同的是，卢生是在客栈里做梦的，而王大妈是看到了万花筒。在外孙女小达尔过生日的那一天，王大妈鬼神错道，偶然一瞥的万花筒，使她突然看破“红尘”。

王大妈失神的那瞬间，想起什么来了呢？想起她自己的童年时代，也曾玩过这红玻璃的花筒，那时她是一个真纯的、愉快而幸福的孩子，想起小达尔她娘的孩子时代同样曾玩儿过红玻璃花筒。同样走上她作母亲的寂寞而无欢乐的道路。现在小达尔是第三代了，又是玩儿着红玻璃花筒，王大妈觉得她还是逃不出这条可怕的命运的道——出嫁丈夫到黑河去挖金子留下她来过这孤独的一生？谁知道？丈夫挖到金子谁知道什么时候作老婆的能不守空房？

萧红通过女主人公王大妈观赏万花筒这一貌似平常的瞬间的刻画来暗喻美好生活终究是一场幻觉。这里萧红采用的是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把女主人公的一个顿悟过程展现给读者。

这些是王大妈从来没有仔细想的，现在想起来开始觉得是这样孤

独，她过的生活是这样可怕，她奇怪自己是终究怎么度过这许多岁月的呢？而没有为了柴米愁死，没有为了孤独忧郁死！¹⁸⁾

笔者认为，这里的“万花筒”即《小城三月》中春的隐喻。春没能改变女性的命运。王大妈由对命运的、人的本能的生存的亢扬转而产生对生命意义的悲观失望，最终导致对生活的厌倦，不满地意识到人们只是在祖先决定的生活准则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单调寂寞毫无意义地生活着。在对人生洞悉觉醒的同时，王大妈的生命之火便也随之熄灭了。这里就反映出萧红心灵深处的创作理念，觉醒不但不能挽救女性，而且还将让女性丧失生存的欲望，最终导致绝望。

这里就反映出萧红心灵深处的创作了理念，觉醒并不能挽救女性。以下字里行间充分反映出萧红的这一意念。这证明她的人生理念是有极端消沉的一面，然而她曾为此努力抗争过，最终却完全从现实世界中跌落到底层，以致逐渐绝望和毁灭。《小城三月》的这一段文字已经清楚的表达出萧红此时的理念。

春，好像它不知道有多么忙迫，好像无论什么地方都在招呼它。假若它晚到一刻，太阳会变色的，大地会干成石头，尤其是树木，那真是好象在多一刻工夫也不能忍耐。

假若春天稍稍在什么地方留(流)连了一下，就会误了不少的生命。¹⁹⁾

《红玻璃的故事》与《小城三月》虽然作品内容不同，但出于同一种思维根源，代表了萧红后期的思想意识。即对人生价值及女性的生存意义的怀疑，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困惑、彷徨与绝望，这充分代表了萧红人生最后的人生理念及创作意念。

18) 萧红《红玻璃的故事》收入《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 1998年

19) 同注8

五

萧红对于女性之死，是从令人惊心动魄的血淋淋的场面开始的，使读者颇受感官刺激的描写，发展到“平心静气”和“淡然处之”的诉说，这种笔法的改变，反映了萧红对女性命运思考的心路轨迹的变化，反映了她对女性命运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这个层面无疑是以“中国人的”和“中国女人的”总体生存状况为背景和参照系数的。

在旧中国，广大劳苦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种权力的压迫。政权属于一定的阶级，具有阶级压迫的性质，而族权、神权、夫权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具有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日军侵华以后，劳苦妇女在原有的四种权力压迫之外，还要承受民族压迫这一新的灾难。足见当时劳苦妇女所承受的压迫和灾难是何等空前深重。正如人们所常说的，在封建社会女性忍受着多重“大山”的压迫，这些“大山”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最终将窒息而死。萧红作品中以沉重、悲哀的笔触所大量描写的女性之死，即生动而形象地向世人传达了她的上述思想旨向。

然而，细读萧红涉及女性死亡的作品，人们又不难发现，她对当时压迫女性的地主阶级政权和具有民族压迫性质的日军入侵，固然给予了揭露和批判，但似乎有时却多少带有一些简单化与程式化的特点，而远远比不上她对族权、神权、夫权——尤其是夫权的揭露、批判来得具体细致和深入彻底。也就是说，作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作家，萧红看到并且表现了阶级压迫和日军入侵给中国妇女带来的苦难与不幸，但让她最痛心疾首的依然是族权、神权、夫权——特别是夫权对女性的压迫，因而，萧红对这三种权力的揭露、批判不但篇幅多，而且笔致“越轨”，描写生动细腻，刻画入木三分，收到了令读者深刻感悟与拍案称奇的艺术效果。

萧红就是通过刻画上述包括老、中、青、少、幼和各种身份、各种死因的女性死者的死亡群像，传达了自己对女性历史命运的关切与不安，展现了自己由于最终悲观、绝望而导致的带有浓重悲剧色彩的女性观。

萧红写了很多的女性死亡，这让笔者想到了歌德的《地狱篇》。也实在是使得读者感到悲伤。萧红用中国女性的死，当成一把利剑，写出那个时代的女性完全和蝼蚁一样的命运，揭示出旧社会封建礼教对弱体女性的迫害。但是在萧红后期的作品中，女性的死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女性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幸来源于社会、来源于礼教、来源于环境。虽然省悟，但是难于“绝处逢生”。这是由于少数人的觉悟，还是难以完成社会的变革。当旧的传统文化仍在束缚人们的思想意识之时，所谓个人的觉醒，也可能不幸走向其反面，促成其精神夭折。这是因为即使在社会已经改革的情况下，传统的因袭对人心理的束缚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破除。正如很多病人明白了病因，但是无力治疗改变处境，反而加速了死亡的来临。

萧红的上述思想旨向及其创作实践，显然同她离开家一生到处漂泊，从男性那里饮过不少“苦杯”有着直接联系，同时也应该是其睿智的理性观察、理性思考使然。纵观和预测人类社会发展史，阶级压迫只是阶级出现后的产物，民族压迫在阶级出现以后本质上则是跨越国界、族界的阶级压迫，它们都必将随着人类进步而逐渐趋于消亡，而夫权或曰男权对女性的压迫，虽然也必将趋于消亡，但较之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其消亡的速度则要缓慢许多，因为夫权或曰男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盘根错节、渗入人心骨髓的传统背景，不可能随着阶级的消亡而迅即消亡。对此，萧红似乎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理性判断，否则既无法解释其对于死于男权的女性之死何以描述得如此惊心动魄，如此深刻彻底，更无法解释其由觉醒到彷徨、最终归于绝望的强烈的女性意识所经历的心路历程。

女性作家萧红可谓走过一条女性由呐喊到彷徨的人生路途，因此她的创作理念也充分地在其作品中留下了比较清晰的足迹。而其作品里充满了对女性之死的描写，更反映出其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深切关注。

参考文献

- 骆宾基 《萧红小传》 建文书店 1947年9月
- 立间祥介 「论萧红」 『中国革命和文学』 日本平凡社1970年出版
- 铁峰 <萧红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辽宁师院学报》 1983年
- 西蒙·波伏瓦 《第二性——女人》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年
- 萧红与聂绀弩之间的对话 《脚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
- 聂绀弩 《脚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
- 刘思谦 《关于中国女性文学》载《文学评论》 1993年
- 钟耀群 《端木与萧红》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年
- 尾坂徳司 『ある中国女流作家の挫折』 燎原書店 1983年
- 黄甫晓涛 《萧红现象》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8月
- 李计谋 《“萧红现象”的文化阐释》（《学习与探索》1993年6期
- 孙延林主编 《萧红研究》第一、二、三辑 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
- 盛英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年
- 丁言昭 《萧红传》 江苏出版社 1995年
- 林敏洁 《萧红研究在中国》 国学院大学 外国语研究2003年
- 金昌镐 《萧红研究在韩国》 ‘呼兰师专学报 2003年
- 林贤治 《漂泊者萧红》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Abstract〉

On the Death of Women Described
by the Modern Chinese Female Writer Xiao Hong

Lin Minjie

The present study analyses the “women’s death” defined by XiaoHong by referring to all of XiaoHong’s works published between 1933 and 1941. Thereby,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lucidate the motivation that drove XiaoHong to writing, her philosophy, and XiaoHong’s unique perception of her miserable lif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death of women” in China in XiaoHong’s era was caused by suppression by the war and social classes, and sexual discrimination. Furthermo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e predicament of women still exists in a different form in the current societ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XiaoHong’s works are worthy of re-appreciation as they reflect the hardships of women of not only old and feudal societies but also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 Xiao Hong, women, death

투 고 일 : 2010. 9. 10. / 심 사 일 : 2010. 9. 20. ~ 2010. 10.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10. 15.